

做人做事做学问

洛南祥题

名家系列讲座精萃

第二卷

邢学亮 陈莉霞

主 编



科学出版社

www.sciencep.com

做人做事做学问

洛角祥题

名家系列讲座精萃

第二卷

邢学亮 陈莉霞 主编
吴锡存 张芝萍 副主编

科学出版社
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由部分两院院士、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、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及某一领域的知名人士的演讲、讲座记录稿汇集而成。这些名人名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,通过对自身的成长经历、社会体验和知识积累的讲述,与大学生进行心灵对话,告诉和引导大学生及青年朋友如何“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”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做人 做事 做学问/邢学亮,陈莉霞主编. —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06
ISBN 7-03-017147-0

I. 做… II. ①邢… ②陈… III. 人生哲学 IV. B8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36376号

责任编辑:李振格 沈力匀 陈晓萍/责任校对:耿耘

责任印制:吕春珉/封面设计:东方人华平面设计部

科学出版社 出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

邮政编码:100717

<http://www.sciencep.com>

双青印刷厂 印刷

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06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:720×1000 1/16

2006年6月第 次印刷 印张:37 1/2 插页3

印数:1—2 550 字数:499 000

定价:60.00元(共三册)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<双青>)



“中国与科学”院士专家巡讲团成员杨叔子院士做报告



同学们踊跃提问



师昌绪院士做“做人 做事 做学问”讲座



同学们纷纷要求与老一辈科学家合影留念

目 录

漫谈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·····	李国杰 (1)
我与“磁悬浮”·····	严陆光 (15)
与有肝胆人共事 从无字句处读书·····	许还山 (30)
在人生道路上·····	师昌绪 (46)
踏平坎坷 立志成材·····	杨叔子 (57)
做人 做事 做学问·····	千福熹 (77)
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奋斗终身·····	邹世昌 (89)
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·····	郑哲敏 (107)
简朴为人 踏实为事 坚持为学·····	李 佩 (123)
在大学为一生打好基础·····	吴心平 (137)
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会做人·····	韩德馨 (157)
我与探月·····	欧阳自远 (172)
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·····	涂光炽 (201)

漫谈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



李国杰 1943年5月生于湖南省邵阳市。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工学硕士学位,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。多年来,致力于并行处理、计算机体系结构、人工智能、组合优化等领域的研究。主持研制成功“曙光一号”并行计算机、“曙光1000”大规模并行机、“曙光2000”、“曙光3000”超级服务器,领导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“龙芯一号”通用CPU。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,2002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。

我喜欢与年轻人交流,也可以说我有点乐为人师。我有好多称呼,有人叫我“李所长”,在公司里大家叫我“李总”,我当了5年公司总裁,可我不爱听别人这么称呼我。一般的人都叫我“李老师”,我很高兴接受这个称呼,因为现在我还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终身教授,也在北京大学讲过课。我想分三个方面讲讲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。

第一,讲讲“做人”。我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以及自己悟到的道理,和大家交流一下。

我的第一个体会是:个人的成功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。有句老话叫“时势造英雄”,用现在的话来讲,就是国家的方针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命运。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,就是个人价值必须融入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去。

我曾受过两位伟人的恩惠,一位是刘少奇,一位是邓小平,



得益于他们制定的正确政策。1960年，我高中毕业，那时候高考要考6门课，每门课满分是100分，总分600分。我6门课的平均成绩是92.6分，按现在的750分折算，我的成绩大概相当现在的695分，成绩不错。但我不敢报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，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，我父亲1958年被错划为“右派”。我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，那时候我以为天文系是搞人造卫星什么的，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搞历法等传统天文学。我读高中的时候，学校把学生分成3类。第一类是出身好的，可以就读外省的重点学校。第二类是中等的，可以进湖南大学、湖南师范大学一类的学校（我是湖南人）。像我这样属于第三类，最好也只能考当地的专科院校。因为我的成绩很好，所以就分配我去一个当时正在筹办的大学，叫湖南省农业机械化学院。当时，湖南省准备造拖拉机，需要一批教师，培养造拖拉机的人才。因为学校还没有建好，就把我们送到湖南大学机械系去代培。1960年冬天，正赶上国家的困难时期，连耕地用的牛都杀了，更不用说造拖拉机。1961年7月，接到通知，由于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停办，在湖南大学代培的学生绝大部分要下放提前分配工作。我实在未曾想到，也不愿意中断学习，但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，被分配到冷水江钢铁厂工作，在工厂被作为中专生分到厂内铁路机务段做机修工。

【2】

到1962年，我已经当了一年的工人。钢铁厂是部队办的，厂领导曾是一些团长、师长，他们对我说：“小李啊，你年纪这么轻，在山沟沟里头，有什么出息，还是考大学去吧！”我就写信去问，像我这样的情况，能不能再考大学，得到的答复是可以。但那时离考试只有一个星期了，一门课只能复习一天。我的分数虽然比第一次低了，但还是在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之内。就这样，我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。我至今仍感激那位到湖南来招生的老师，他忠实地执行了当时的政策。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把这条政策作为“修正主义”路线批判。

北京大学绿树成荫、湖光塔影、环境宁静。但从1963年起，

学校就开始学“九评”、搞“社教”、“四清”、“五反”，运动一个接一个。1966年6月，我们从四川参加农村“四清”运动回校，又赶上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彻底地停课了。1968年，我又一次被扫地出门。毕业分配的时候，我们物理系的分配指标是可以和生物系对调的。我先被分到了贵州，后来又调回到湖南邵阳市无线电厂（后改名为邵阳计算机厂），当了一年的电镀工。电镀工的工作，一上午就做完了，下午就开始看计算机方面的书，空余时间还可以搞点技术革新。1974~1976年，我参加了电子部在清华大学组织的计算机设计工作，边工作边学习计算机知识。这时，邓小平开始主持工作，恢复研究生制度。我在小城市里，不知道这个情况。等我到北京出差，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，已经快开始考试了。我拿不准报哪个专业的研究生，就翻报考指南，看到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招研究生要考物理，就决定报考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，20人取一个，我幸运地被录取了。

我这两次走运，都和国家大形势有关系。一个是刘少奇制定的“分数面前人人平等”政策，没这个政策我是上不了北京大学的。第二个是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恢复高考，招收研究生。后来派留学生出国的政策，也是在邓小平主张下制定的。以前出国是一件很难的事，都是公家派的，要审查。1980年，普渡大学黄铠教授来北京讲学，要招一名博士研究生。我的导师夏培肃先生对我说：“我想推荐你到美国去读书，你愿不愿去？”当时，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想法也与现在的学生不大相同。我回答说：“要是两年左右能拿个博士学位就去，如果长了就不想去，我都30多岁了。”我是想年轻的时候不做事，读书都读老了。从小学到研究生，到出国留学，我总共读了26年书。一个人一生有多少时间？所以，我极力想把丢失的时间捞回来。在导师的鼓励下，我出国用4年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。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开放政策，哪能轮得上我出国，根本没有这个机会。

我从自己的经历得出结论：一个人的成长与整个环境、国家



的大政策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么好的环境，让大家可以按自己意愿体现自身的价值，真是来之不易啊！不提过去有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建立新中国，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后，还有很多人受过很多委屈，走过很多弯路，才有今天的好形势。所以，大家要特别珍惜现在这个机会！

下面，我讲一讲对我的成长有影响的古人、今人说过的一些话和做过的一些事。我在读小学的时候，就受到过一句话的影响。那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：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。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。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：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这样，在临死的时候，他就能说：‘我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，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’”这段话，我从小学开始就记在心上了。我的俄文忘得差不多了，唯独这段话的前面几句，我还可以用俄语背出来。这段话告诉我们，人的一生不要碌碌无为，不要虚度年华，要有所追求。

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故事。有人问陕北放羊的小孩，“你放羊为了什么？”“放羊为了挣钱。”“挣钱为了什么？”“挣钱为了盖房子，找老婆。”“找老婆干什么？”“生孩子。”“生孩子干什么？”“放羊。”又回来了。同样的故事，还有海滩上的渔夫版。有追求和没追求是不一样的。你可以过一个没有追求的生活，但有追求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。放羊如果不是完全为了谋生，也可以做成一番大事业。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是一个事业，为浙江省的富强而奋斗是一个事业，为宁波市的富强而奋斗也是一个事业，哪怕只是为一个单位而奋斗，这也是一个事业。我们不能完全为个人而活，小我和大我要有一个融合。一个人的一生，如果只是为了给自己挣钱，就不会有太大的动力。

小时候我写作文，动不动就说要做祖国的栋梁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正直的知识分子，看完我的作文后，他对我说：“你知道什

么是栋梁吗？栋梁一定要是直的，如果是弯的，就做不成栋梁了。一棵树如果长得不是很直，不是很粗，长出来有点弯，当不了房梁，没有关系，还可以做犁，或者做牛轭。”牛轭就是牛耕田的时候，挂在脖子上的东西，它的形状是弯的，直的树木做不了牛轭。当时，我就傻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并因此懂得了——一个道理：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，要根据自己的才能去做事，不要一味地想着去做栋梁。这些事情在潜移默化中，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我父亲一生的路，可以说走得不是很顺。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师范大学学教育，大学毕业后当中学老师，新中国成立后被派到一个县的中学当校长。本来还是很受器重的，反右的时候，他提了一些意见，这些意见现在看来完全可以接受，比如应该发挥老年教师的积极性，应该重视改善农民的生活。但就是因为这两句话，他付出了 20 多年的代价。父亲话不多，也不怎么管我的学习，不像其他家长整天催着你去做作业，但像刚才讲的话，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1960 年，我高中毕业刚满 17 岁。当我读北京大学的时候，已经 19 岁了，比班上多数同学大一岁。所以，我特别珍惜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。我在我床边的墙上，贴着自己画的一盏窗口内的桐油灯，底下写了一行字：“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”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在北京大学期间，我觉得我确实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。我在北京大学读了六年半书，只回了两次家，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没钱。很多知识分子都有午睡的习惯，大部分同学中午要回宿舍睡觉。大学几年，我中午从不午睡，基本是在报刊杂志阅览室度过的。当时北京大学有个第五阅览室，里面都是一些杂志。北京大学还有间小书店，因为没钱买书，很多书我都是站在书店里看完的，好几次都被老师碰上。我是喜欢看书的人，文学、历史、经济、哲学等方面的书，我都看了不少。理工专业的学生多读些文科方面的经典著作是有益的。《红楼梦》大家都读过，各人的理解可能不同。毛主席对《红楼梦》有过评价，说《红



楼梦》的主题就是“好了歌”。“好了歌”我还能背下来：“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！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！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娇妻忘不了！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！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？”“好了歌”确实令人深思，但我和别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。多数人是消极的方面来解读，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，它与“淡泊明志”的思想有关系，就是不要太看重金钱、功名、美女等。这点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。

还有两幅对联。一幅是林则徐的，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”，这幅对联包含很值得深思的道理。越能包容，心胸就越宽阔；你没有过分的欲望，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刚强的人。我们计算所曾经开展过“扩胸运动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一幅，是诸葛亮的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。我写给工程院的院士自述文章，题目就是“宁静而致远”，这不是装出来的。我有一位大学同学，在合肥工作，有一天晚上，我住在他家里，聊起过去的事情。他问我：“李国杰，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现在追求宁静。”他听了之后，一愣，然后说：“这是最高境界了。”“宁静”是什么概念？当时，我是曙光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。上午要见公司的经理，谈生意，下午要找研究生谈话，写论文、做学问。一天下来非常疲惫，只有礼拜六、礼拜天的时候，我才感到比较宁静，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我从心底就不喜欢进歌舞厅，请吃请喝拉关系什么的。所以，当了5年总裁，我就不当了。回到计算所之后，我非常坦然，非常高兴。不是说我没有本事，现在公司已经上市，还在不断壮大，很多年轻人也起来了。这里面有个人爱好问题，我对生意场上的应酬就是不太感兴趣。

我们计算所每年有一批博士生、硕士生毕业，在毕业典礼上，我每年都要讲话。我经常要引用陈毅元帅写给他儿子的诗里的两

句话，“应知天地宽，何处无风云？应知山水远，到处有不平。”为什么要讲这两句话？现在社会上，有很多不好的现象。在他们走向社会之前，先给他们打一支预防针，要他们知道走上社会之后，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，要学会正确对待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我经常用的有两句话。一句是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那时候，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因此现在我能应对各种事情，能识别一个人是否正直。另外一句是：“河出潼关，因有太华抵抗，而水力益增其奔猛。风回三峡，因有巫山为隔，而风力益增其怒号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个人做事的过程中，如果完全是一帆风顺的，他的力量会变小，而遇到一些困难，反而会使他更加有力量。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，人才是逼出来的。我们计算所的“基本法”中也讲到困境出人才。我们做曙光机、“龙芯”CPU，都是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做出来的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我经历了一些你们未经历的事情。红卫兵大串联时坐火车不要钱，一节火车车厢 108 个座位，坐了 200 多人。我没坐火车，而是 10 米个人，打了个小旗子，从北京走路走到延安，一共走了 50 多天。中间每隔一两天就要做宣传，做调查采访。真正走的时候，一天要走 100 多里路。在步行过程中，我发现了很多我原来从不知道的事情。我们到了狼牙山、延安，发现越是革命老区越是穷。那些地方的农民，一天工作下来，只能挣到 8 分钱。我们走了两个月，连一点油水都没沾过。这还不算什么，过了黄河以后，到了一个县城，叫瓦窑堡，我们进了瓦窑堡的一个煤矿。小时候，我看过一个电影叫《燎原》，对矿工的生活记忆犹新，总觉得矿工是最悲惨的。我们去的那个煤矿，里面连支撑的木头都没有，整个煤层只有 1 米厚，在里面根本没法坐起来，只能爬。当地政府的政策是挖出煤来就有工资，挖出石头不给钱，所以坑道越挖越窄。那还是国营的煤矿，况且已经解放 20 年了。当时，我们就把县长请来了，请他和我们一起下一趟



煤窑，让他亲自体验一下工人们的生活。工人们非常感激地说，这么多年来，还没有一个“县太爷”来看过他们。走过这些地方以后，你就会深刻地感受到，在中国这块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土地上，我们的农民、工人的生活，还是非常贫困。一路走来，我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。

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，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疑问：我们中华民族有 5000 年的历史，我们那么辛苦地工作，为什么还赶不上人家只有 200 多年历史的美国？有的人会因此而产生逃避的心理：我为什么要去过这种日子，干脆跑到美国去好了。但也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的，他们看到这种情况，会产生一种责任感，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我觉得自己属于后一种人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总想着自己能早点回来，想着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变得更好一点。每个朝代总有一些人有忧国忧民之心，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。

以上讲“做人”，下面讲讲“做事”。第一，要有自信心，第二，要有拼搏精神。

做事，一定要有自信心。我要在“自信心”前加个定语，就是要有“自知之明”的自信心。为什么还要加个定语呢？我在计算所当所长的时候，经常接到一些很有“自信心”的人的来信，说他们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，非常执着，甚至和爱人离婚了，房子也卖了，还要继续干。其中有很多人缺乏自知之明。但现在很多情况下，我们没有把事干成，不是因为自信过头，而是因为没有自信。我们做“龙芯”芯片，网上有人讲，美国人几十亿的投入，有几万人在做芯片，你们才投了几千万，只是几十个人在做，你们也想做芯片？按这个逻辑，无法想像当年我们怎么能用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。我们不能跪着做事，基本条件是要先站起来。但是非常遗憾，有很多人现在还是跪着的。几年前，我参观上海市的一个飞机设计所。所里有个人的展览厅，进门的地方有幅非常醒目的题词，这是我们工程院的院长宋健题的。一

般的题词都喜欢讲好话，惟独这个题词，我看了以后感到震惊。他题的是“站起来吧”4个字。后来，宋院长在工程院院士大会上也讲过这件事。他认为我们国家的飞机搞了50年，还是大量地买“波音”飞机，造不出我们自己的大飞机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站起来。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。

自信心不光是对个人能力的自信，更重要的是要有对国家的自信。在《文明的冲突》这本书中，提到1820年前后，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值的32%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，在人大会议讨论的时候，我发言时讲了这个统计数据。有人问我，这个数据是否有根据？我说这个数据是从书上看到的，根据当时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，比如铁器、纺织工具等，以及国外的有关贸易统计资料，经过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得出的。不管怎样，世界上都承认，当时中国经济占世界1/4~1/3强，但后来就不行了。现在国外一些权威的经济学家都预测，大概到2050年左右，中国的GDP又会恢复到1820年左右的水平。也就是说，资本主义在风光200年之后，将衰落下去，到那时，现在所谓“七强”的GDP加起来占世界GDP的比例，可能又会回到1820年的水平。

在建立自信心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应学习两位伟人。一位是毛泽东，他在年轻时就讲过一句话，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击水三千里”。所以，无论日本人还是国民党，他都不怕。现在，我们也得要有这种自信心。另一位是马克思。英国剑桥大学在2000年底，做了一个民意测验，调查“谁是上个一千年中最伟大的思想家”，投票结果第一名是卡尔·马克思，第二名是爱因斯坦。后来，BBC电台对所有西方国家做同样的调查，结果仍然第一名是卡尔·马克思，第二名是爱因斯坦。你们可能认为对西方人来说，马克思是他们的敌人，会觉得这个结果很奇怪，其实外国人是敬仰马克思的。马克思帮了资本主义一个很大的忙。他在他的学说里，为资本主义开了三套药方：第一实行累进所得税，第二实行遗产税，第三实行对工人的失业补助。正因为如此，资本主义才可以延续



到现在，还没垮台。当然这个观点还有争议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资本主义国家是非常尊重马克思的。我在普渡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发现学生可以选修一门课叫《Marxism》，就是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学。了解西方人民对马克思的崇敬，可以增强我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信心。

有自信心是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前提，我们成功研制曙光机就是一个例子。我那时刚从美国回来，出国之前我研制过计算机，回国的時候已经在国外发表过很多计算机方面的文章。当时，我担任了智能中心主任，主要任务就是研制高性能计算机。开始我花了近两年时间寻找合作伙伴，没找到。有人说，找什么合作伙伴，把钱给我，我给你造出来就完了。我们没有那么做，而是找了一批年轻的学生，大多数都没有造过机器，都是搞应用的一些人，像现在计算所副所长樊建平，以前是搞计算机辅助汉字字型设计的。如果我当时有一点犹豫，机器肯定造不出来。经过一两年的准备，主要是分析 UNIX 操作系统源码。国家智能机中心开了个誓师会。会上我非常明确地讲，我们要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到美国去，并不是进美国的企业，而是到那边租间房子来住，研制“曙光一号”并行机，因为美国大环境比国内好。我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：“派你们去，就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机器造出来。”我看到他们的眼里含着泪光。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：“李老师，如果我们不把机器造出来，就没脸见江东父老。”他们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出去的。我去美国看过他们好几次，他们租了美国的一间民房，在地上摆两个床，在客厅里摆个电脑搞设计。每天基本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，也不太出去，困了就躺一下，醒了继续搞设计。不到一年，他们就把机器设计出来了。

我们做“龙芯”时，也面临这个情况。当时计算所的人真正懂芯片设计的人并不太多。因此，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计算所能造出通用 CPU 来。谁领头干这个事呢？这时候跳出一个人来，一位 30 岁出头的研究员，叫胡伟武，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。当时，

他跑到中国科技大学，发现他读书的时候用一个个小元件堆出来的 8086 印制版还在，感慨万千。他信誓旦旦地打电话回来：“如果我不把‘龙芯一号’造出来，我提头来见。”你说这样一个敢拿生命来做担保的人，你能不相信他？这不是开玩笑，他确实有这种激情。所以，我们就把任务交给他了。他当时带了一队人，有许多还是学生。有人觉得很奇怪，这么一支没有做过 CPU 的年轻队伍怎么可能造出芯片来。其实，他们对 CPU 的工作原理有非常深入的理解。除了他们的技术积累外，他们的自信心和拼搏激情是获得成功的保证。当年智能中心开誓师会时，我叫人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：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。后来，做“龙芯”芯片的时候，胡伟武他们又把这几个字贴在墙上。

我体会到，艰苦奋斗不完全体现在生活上，主要体现在思想上，这里面有一种敢于闯关敢于奋斗的思想。当年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司长，后来调到联合国去当科技参赞的冀复生，是一直看着我们成长的。他去联合国之前，做了一个背靠背的调查。他找“曙光”的用户，采访他们对“曙光”的看法，最后他写了一个报告，报告上有一段话使我很感动。他说“曙光”这支队伍，很像芦沟桥事变后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。冀复生回来后，他写了一封信给智能中心，他说，他当年在国内的时候，作为高新技术司司长，看到我们这批人在搞曙光机，当时的感受就像在岸边看着红军抢夺卢定桥的时候一样。现在虽然不用打仗了，但在高科技领域，像卢定桥一样的阵地还等着我们去夺取。这封信又使我们很受鼓舞。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胡伟武写的两篇文章，一篇叫做《我们的 CPU》，另一篇叫做《我们的“龙芯一号”》，计算所的网站能找到。许多人看了以后都热泪盈眶，因为文章写得非常真实。后来这篇文章被贴到美国 MIT 大学的 BBS 上去了，那是一个英文版的全世界留学生的 BBS，自从他的文章贴上去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用中文写了。有的人说，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胡伟武就跟他叫板，说“就算是 MIT 里的博士，如果能在一个学期